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刘象愚 著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Culture



NLIC 2970700298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刘象愚 著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Culture



NLIC 2970700298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刘象愚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7583-0

I. 从… II. 刘… III. 比较文学-研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5489 号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刘象愚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赖英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90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583-0/I·573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自序

己丑年春节过后不久,炳辉从沪上来,说天振、思和和他三位教授策划出一套有关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文集,由那些较早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选收自己的文章,先行编辑出版,然后再扩大范围,不断出下去。第一辑中包括了我,这样,就把我梳理自己有关这一领域一些观点的思路提前了。

应该说,我是比较早地从事这一领域的大陆学者之一。我之所以进入这一领域,既是个人兴趣所致,也是历史机遇使然。

就个人兴趣而言,我对中外文学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古文和古典诗词,本来是要考中文系的,结果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外文系,不过,对于老天的这一安排,我并不觉得遗憾,反而有一种塞翁失马的欣悦感,因为我自信自己一定能学好外文,实现从小就打算遍游世界的梦想。幼年在乡村小学上二年级时,我们常玩一种所谓“开火车”的问答式游戏,那时我的火车就已经“开”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对于世界上的那些名山大川,我总能倒背如流;在中学时学了6年俄语,我的口语和笔试总是全班第一。我还特别喜欢俄苏歌曲,能用俄语演唱一些著名民歌,颇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当时还读过一些俄苏和西方小说的译本,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静静的顿河》、《红与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堂吉珂德》、《大卫·科波菲尔》、《天方夜谭》之类。我自以为对语言和文学的感觉相当好,因此,在进入外文系英文专业的时候,很快就沉潜在一种对新的语言与文学的研习中。大一主要集中精力攻语音、语法、词汇、句法等,到大二时已可以对照译本阅读原作了,那时喜读中华书局出的活页文选,对著名前辈学者们撰写的有关英美诗文的赏析性文字爱不释手,同时还进一步扩大文学名著的阅读,对莎士比亚、但丁、狄更斯、萨克雷、哈代、马克·吐温、奥斯汀、勃朗特、歌德、普希金、契诃夫、莫泊桑、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

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主要著作都有所涉猎。而且特别热衷于翻译练习，对严几道的译事三原则奉若神明。记得读《哈姆雷特》时，曾反复吟咏哈姆雷特写给奥菲莉亚那首情诗：“Doubt thou the stars are fire,/Doubt that the sun doth move,/Doubt truth to be a liar,/But never doubt I love”。心想能写出这样美妙、隽永的千古绝句，莎翁真不愧是文坛巨擘。对照当时看到的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觉得就“信”、“达”而言，可以说无可挑剔，但心中仍在不断琢磨，能否译得更雅些呢？譬如，译成五言、六言甚或四言有没有可能？记得我都作了尝试，但都不满意，因为很难兼顾严氏三原则。现在想来，也许只有其中的五言一种或可差强人意（可疑星为火，/可疑日不落，/真理成谎言，/我心永不变）。更重要的是，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常会发现中外作家在表现手法上往往有类似或暗合处。譬如琢磨莎翁这首小诗时，脑子里会自然浮现出我国古代民歌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及苏格兰诗人彭斯诗中“*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Till a' the seas gang dry./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之类的句子。当时并不知道“比较文学”为何物，只是惊异于天下诗人在写情誓诗时何以竟能如此相似，今天看来那也许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比较意识了。

正因为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过程中，打下了比较厚实的中外文学根基，因此在“文革”十年浩劫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体制的1978年，当我面对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萨克雷的《势利者集》(*The Book of Snobs*)和奥登写抗战中中国士兵的那首十四行诗之类的考题时才不致慌乱。今天看来，当时的答卷当然远不理想，但它毕竟让我登入了外国文学的殿堂，为我日后的外国文学甚至比较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我之所以略显作秀式地回顾个人求学过程中的这些经历，只是想表明，我对中外文学兴趣的养成和已经形成的基础，与我后来被比较文学所吸引乃是一种逻辑关系。

就历史机遇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研究院学习外国文学的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肇始之初，解放思想成为变革的先机，文化界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十分活跃，大家开始反思“文革”十年甚至更早的“十七年”中各种律条如何束缚了人们的心灵，进而导致了思想枯竭和文化荒漠的现实

局面。外来的各种思潮开始进入人们禁锢十余年之久的头脑；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等一批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销声匿迹的学界大师们的身影和他们的著述又开始回到社会的关注之中，人们开始热烈议论他们的学术思想、他们的道德文章，特别是1979年开始陆续问世的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该书以古文撰述，包含了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西方文字，让我们这一代学子大开了眼界。当时，我们这些在社科院和北大攻读外国文学的研究生中许多人有较好的古文功底，而且正在学习二外和三外，因此能较为顺利地进入阅读和讨论。钱著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依托，出入古今中外，涵纳文学文化时空的各种层面，大如观念现象，小如字词章句，皆能广征博采，相互比勘、相互生发，且信手拈来，皆成妙文。该书跨界论述的特别方式与当时已渐为国人所知的比较文学方法颇多暗合之处，学界有人开始呼吁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外国文学界著名前辈学者季羨林、杨周翰、李赋宁等率先建议在高校建立比较文学的学科。在我从研究院毕业的1981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随后几年，京沪等各地高校纷纷响应，成立研究机构、发表文章、开设课程、组织学术研讨会议的消息此起彼伏，倡导比较研究的呼声渐成燎原之势，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呼之欲出。

我从1981年秋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今外文学院前身）任教。应该说，北师大外语系是国内高校中有一定基础和水平的系，其俄苏文学一直处于国内这一领域的前沿，其英语语言教学也在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正如当时国内大多数外语系科一样，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层面的教学上，而于英美文学却甚少关注，有关英美文学的课程寥寥，我所承担的课程主要是泛读一类。正在我为学而不能致用忧心忡忡之际，一个难得的转机出现了。大约是1982年夏秋之际，中文系外国文学的陈惇教授等人致力于建立比较文学的教研机构，他积极推动钟敬文和黄药眠两位先生联袂向校长上书，建议成立相应的组织。钟先生是国内民间文学界泰斗，黄先生是久为人知的文论家和诗人，两位重量级教授的建议引发了校长的注意，校长立即批示同意。于是，“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组”在中文系成立。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北师大中文系曾以名教授云集、学术实力雄厚名噪一时，虽然此后数十年间随着不少名人的离去而元气大伤，但由前人奠定

的根基依旧比较坚实。民间文学、文学理论、古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代有优秀传人,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居于领先地位。就其外国文学学科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初,穆木天和彭慧两位著名学者领导一批年轻学者创立了最早的外国文学学科。该学科点延请俄苏文学专家,成功举办了两期有关俄苏文学的研讨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最早的俄苏文学专门人才,参加这些研讨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国内许多高校外国文学学科的带头人和骨干。北师大外国文学学科以其俄苏文学教学研究的实绩在国内享有盛誉,改革开放之初,它又迅速重组了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的研究队伍,在总体实力上保持了在国内的重大影响。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学术团队不仅具有接纳一个新学科的条件,而且也有接纳一个新学科的眼光和自觉。比较文学研究组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和氛围中诞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当陈惇先生找到我,提议我加盟中文系,和他一起为建立北师大比较文学学科点而努力时,我真是大喜过望。对于比较文学,我当时已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已是心向往之。能够脱离当时毫无文学情趣可言的环境,转入自己颇感兴趣的领域,我何乐而不为?对于北师大中文系,我是慕名已久,更是心向往之。1962年高考时,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正是北师大中文系。据说我的成绩完全超过了北师大那年的录取标准,但却被硬留在了地方高校。现在忽得上天眷顾,居然可以圆20年前的旧梦,进入向往已久的名校名系,当时内心的激动和欣喜实非语言可表述万一。于是,在1982年年底前,我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研究组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生涯。唯物主义者不讲宿命,正是当时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使我进入了比较文学队伍,这就是我说的“历史机遇”。

中国比较文学是改革开放在学术领域孕育的一个新生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共生,同样走过了自己30年的生命历程。倘若我们更严格一点,把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诞生和第一届中国比较文学大会的召开看作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它也将在不久的数年后迎来自己的而立之年。作为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我与一些同代学者一样,见证了这一学科在中国诞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它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仍旧存在的不足。然而,当我今天回顾自己在过去近30年关

于这一学科的基本思想时,我的思考则完全是个人的。

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我的比较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对比较文学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上,譬如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什么、比较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中的各种问题等,换言之,我的著述与文章主要集中在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上。

我开始做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初几年,主要是研读国外和港台学者的有关著述,和同仁一起翻译出版了韦勒克的《文学理论》(1984)、编辑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86),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函授中心举办的外国文学讲习班撰写了10余万字的《比较文学》(1984—1985)讲稿,分作10讲,铅印成册,发送到参加讲习班的学员手中。正是在这个讲稿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我与陈惇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1989)。我最初比较文学观基本上体现在这两部书稿中。

本书之所以题名《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意在说明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也反映了我对比较文学的一个总体看法。在我看来,比较文学自诞生之后,其疆域不断拓展,近20余年间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了比较文化的领域。而我个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在不断变化中深化。因此,收在此文集中的短文《比较文学的变与不变》可以看作全书的关键。“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成为我编选全书的一个基本线索。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除少量未刊稿外,大多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学术界》、《中外文论与文化》等学术刊物或其他文集、著作中。本书没有完全按照发表和写作的时序编排,而是作了适当的调整组合。《比较文学学科前史述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三阶段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和《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互阐发》是一组撰写和发表于早期的文章,主要讨论比较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其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此次编入时重新加以校读,订正了一些失误,补充完善了一些文字,但主要观点仍一如其旧。它们基本上体现了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比较文学观。这组文章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第一,比较文学是19世纪晚期出现在欧洲的一个新

学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文化和文学交流融汇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意识的觉醒,比较意识的发展,从歌德到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出,“进化论”、“因果论”和“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的产生,“比较”一名在自然科学与语言学、文学研究中的使用等成为这一学科诞生的历史先决条件。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三种基本方法,三种方法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结合又各有侧重。第三,对中国学界来讲,比较文学是一个舶来的观念。然而以这一观念来衡量,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演变同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其史前史从佛教传入至20世纪80年代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历史演化。《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依据》、《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比较文学的变与不变》分别写成立于90年代中期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前几年,虽然在时间跨度上比较大,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反映了我个人比较文学观的变化。90年代中期之后,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领域拓展的势头越来越猛,特别是伯恩海默的第三个“十年报告”出炉之后,比较文学向文化转向成了不可阻挡的大潮,比较文学不再以文学为中心,而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一个标志学科,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开始再次提出究竟什么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我也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比较文学观。我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危机不断,这种危机归根结底是学科理论的危机。危机的表现是,由于年轻不成熟和潜在的矛盾,比较文学一直未能形成一套能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基本理论;更令人忧虑的是,不少学人对于学科基本理论的探讨和建设并没有多少兴趣,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第二,我在早期曾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的观点,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我与陈惇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1989)一书中。随着比较文学大势的演化与我自己认识的深入,我觉得这种“四跨”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使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毫无节制地蔓延,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提法难辞其咎。因此,跨民族和跨语言的原则应该坚持,而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原则需要慎重对待。第三,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不仅是一种方法;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是一种跨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当代意义》、《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危机说”辨析》、《巴斯奈特

比较文学“反思”之反思》是一组与比较文学界几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对话、商讨的文章,写于近几年,其主旨与上一组文章一脉相承,进一步申说了我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观点:比较文学必须加强自身学科理论的建设,必须在理论上界定自身,才能摆脱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特别是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相当一批学者(尤其是一些影响颇大的学者)高唱比较文学“死亡”、比较文学放弃界定自身、比较文学走向“文化”的大语境下,强调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更是刻不容缓。《文化观念的演化》、《法农与后殖民主义》、《类后现代主义或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误读与创造》是一组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距离比较大,但讨论的主要内容却是中西文化。读者不难在这些文章中看出作者出入不同文化并自觉作出比较研究的意图和努力,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组关于比较文化的尝试。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是为这部文集新写的一篇较长的文章,它是我对自己的比较文学观的再次梳理,表达了当下我对比较文学的基本认识。在此文中,我讨论了比较文学的四种基本性质,并呼吁坚持这些基本性质,同时我也分析了传统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根本原因,指出了这种转化的历史必然性。需要说明的是,站在传统的比较文学立场上,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转化对比较文学这一年轻学科的巨大伤害和冲击,从而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转化的沛然不可抗拒,从而采取顺应乃至欢迎的态度。但就总体而言,我的立场是偏于传统和保守的。我对学科理论的多方申说和对学科理论建设的反复强调表明了我对传统比较文学观的固守。细心的读者当不难看出,此文字里行间流露出我对这种转化的一种 ambivalence 的复杂情绪;更需要指出的是,此文中的观点与我早期的观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距离,这里既有承接,又不无抵牾,它既是我个人比较文学观的一个发展,也是我这些年思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归结。

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大规模地向文化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化转移了。比较文学的这种变化既是一种历史的变化,那就不以学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在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中,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加强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建设的必要性。易言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跨界性与文学性的原则。我相信并且希望,在比较文学大步走

向比较文化的今天,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守在传统的比较文学领域内,即仍然将比较文学看作一种文学研究,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的基本方法,深入探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通过或宏观或微观的比较、分析、归纳、综合,不断提升人们对文学的种种基本问题及其艺术魅力的认识,并由此进一步看到人文精神的培育和提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绝对重要性。至于比较文学或者说比较文化在未来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则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了。

作为一个文集,但愿本书不仅能够记录我个人比较文学观的发展与演化,记录其中的连续性、矛盾性乃至褊狭性,同时也能为后人反观比较文学这段演化的历史留下一些可资探讨的资讯与空间,为他们在未来的某个历史时刻寻绎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蛛丝马迹提供某些可以进一步查证和讨论的线索。当比较文学发展到一种无法想象的形态时,未来的学人们会对当年的比较文学发什么样感慨呢? 知道了。是为序。

己丑岁尾一稿

庚寅夏日改定于京师园一得堂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学科鸟瞰与历史线索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2
比较文学学科前史述略	33
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三阶段论	46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	61

第二辑 对学科理论发展的思考

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	92
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互阐发	106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依据	129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	146
比较文学的变与不变	159

第三辑 与国际比较学者的对话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当代意义	164
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	175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析	198

第四辑 文化及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文化观念的演化	230
法农与后殖民主义	254
类后现代主义或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	265
误读与创造	279
——荣格对《太乙金华宗旨》的心理学评述	
跋	288

第一辑

学科鸟瞰与历史线索

-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 比较文学学科前史述略
- 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三阶段论
-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诞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一新兴学科大规模地进入中国高校和学术界也有 20 多年的历史了,然而,关于它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界定学界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一般人心目中,它更是一个模糊甚至陌生的领域。

在笔者看来,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说研究领域,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它具有与其他一些相关学科或者说领域(诸如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世界文学、艺术史、思想史、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区别的独特性质,主要是跨界性、文学性、精英性和理论性。正是这些性质的结合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而在这四个基本性质中,跨界性与文学性又是最本质的两种。精英性是由跨界性决定的;理论性虽与文学研究的一般要求不无相合之处,但比较文学对理论性的强调却有自身更为显著的独特性。

一、关于比较文学的跨界性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学科,说千道万,最根本的一条是由其“跨界”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跨界性”。正是这样一种性质使比较文学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拓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土,使其区别于其他的文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说,这种“跨界性”正是使比较文学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这一点大抵是比较学者的共识。从学科早期的拓荒者到后来各派的领军人物,直到最近的研究者,大家都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譬如,早期美国学者查尔斯·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明确地说: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首先是“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existing between distinct nationalities)的文学关系;1896 年开始在苏黎世大学教授比较文学